

李立新 吴丹 兰 荣 著

蒋介石与宋子文

吉林人民出版社

蒋介石与宋子文

李立新 吴丹 兰荣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蒋介石与宋子文

(吉)新登字 01 号

蒋介石与宋子文

著 者 李立新 吴 丹 兰 荣
责任编辑 李书源 封面设计 翁立涛
责任校对 苏 源 版式设计 苏 源

出版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长春科技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316-4/D·849
定 价 8.5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北伐道蒋宋	(1)
一、蒋介石志不在封侯，挑起迁都之争 宋子文追随正统 针锋相对.....	(1)
二、随着个人势力的膨胀，蒋介石撕下面纱， 开始公开背叛革命；宋子文对美国记者 希恩说“你看，事实是，我不是一个 社会革命者”	(5)
三、寻找婚姻的最大价值，蒋介石五年苦心追求， 终成正果；从反对到支持，宋子文终成郎舅， 二人形成裙带，走到一个战壕.....	(17)
第二章 乱世说蒋宋	(36)
一、上任伊始，面对众多难题，宋子文呼吁裁 兵减费，靠发行公债艰难度日；北伐成功， 相对宿敌，蒋介石借裁兵编遣排斥异己， 中原大战称雄.....	(36)
二、国难当头，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 面对危机 宋子文亦言抗日.....	(53)
三、蒋介石对郎舅仍存延揽之意	

宋子文虽下野却从未甘寂寞.....	(75)
四、张杨西安发动“兵谏”，逼蒋抗日	
宋子文充任“和平使者”，国共再度合作	(91)
第三章 抗日谈蒋宋.....	(116)
一、在争取外援赢得抗战胜利上蒋宋一致，从 “驻美代表”到外交部长，宋子文回到中枢 ...	(116)
二、蒋史风波，宋子文联内拱外 一波三折，史迪威被召回国.....	(132)
三、中苏谈判，蒋宋“大国梦”难圆 妥协退让，宋惟蒋马首是瞻.....	(151)
第四章 内战论蒋宋.....	(167)
一、抗战胜利，宋子文在经济“劫收”中敛财 不余遗力；积极内战，蒋介石一意独裁导致 “黄金风潮”	(167)
二、虽然从政坛顶峰跌落，蒋对宋子文依旧青睐； 偏于东南一隅，宋子文继续为虎作伥.....	(179)
第五章 残局查蒋宋.....	(191)
一、寄居他乡，宋子文梦里不知身是客 偏隅台湾，蒋介石无可奈何花落去.....	(191)
二、相逢一笑，蒋宋恩怨未泯 客死他乡，宋子文身后凄凉.....	(203)

第二章

北伐道蒋宋

一、蒋介石志不在封侯， 挑起迁都之争 宋子文追随正统 针锋相对

1926年9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便致电广州革命政府，提议迁都武汉，电文言辞恳切；希望政府主席谭延闿最好先到武汉主持一切、应付大局。10月，广州政府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暂不迁都。蒋介石得到消息后，再次致电广州政府谭延闿和张静江等：“武汉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这时，迁都的建议得到了一批高级将领及党政要员的支持，就连时任总顾问的鲍罗廷也认为迁都武汉是明智之举。鉴于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11月中旬做出了迁都武汉的原则决定。11月16日，派宋庆龄、孙科、徐谦、宋子文、陈友仁及鲍罗廷等一大批人经江西赴汉，为迁都作进一步调查、布置。此时的宋子文已是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宋子文能够在政治舞台上头角崭露，与他在广州追随

孙中山，参加广东革命政权的活动有直接关系。

1923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急需各方面人才。这时，宋庆龄将弟弟宋子文引荐给孙中山，被任命为大本营秘书，由于宋子文积极为孙中山出谋划策，解决了一些财政困难而得到孙中山赏识，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广州中央银行行长。在1924年10月发生的广州商团叛乱中，宋子文临危不乱，帮助孙中山制定粉碎商团叛乱的计划，使宋的地位急骤上升。而使宋子文在国民党中央站稳脚跟，能够与重要人物平起平坐是在孙中山病逝后。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笃，孔祥熙、宋子文、孙科、汪精卫四人共商著名的《总理遗嘱》，并在《遗嘱》上签字，以见证人的身份参加了治丧事宜，这一切使宋子文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

1925年9月，时任广东商务厅长的宋子文在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亡后，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财政部部长兼广东财政厅厅长，并仍保留中央银行行长与商务厅长的兼职。

迁都武汉，宋子文是赞同的，所以他抱着极大的热情与二姐宋庆龄及孙科等于1926年12月初到达南昌，并与蒋介石在7、8两日于庐山举行了会谈，讨论了有关财政、军事等要案。12月10日，宋子文等抵达武昌，受到盛大欢迎。

宋子文先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武汉分会成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跻身于武汉政府的决策核心。

恰在此时，蒋介石挑起了迁都南昌之争。

提议迁都武汉是蒋介石，挑起迁都南昌也是蒋介石，究其原因：首先，由于北伐军的深入，武汉和两湖地区便处于唐生智部的控制下，蒋十分害怕，武汉迁都若成，蒋就不可能任意

发号施令。其次，北伐的胜利激发了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两湖地区的工农群众运动更是声势浩大，这些斗争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蒋害怕工农运动，更害怕武汉政府受工农运动影响而“赤化”。再次，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设于南昌，他的亲信部队控制着江西和福建一带，改都南昌更有利于他控制政府，实现独裁。所以，当第二批和第三批广东政府中央委员路过南昌时，蒋介石与国民党中央代主席、他的把兄弟张静江串通一起，于1927年1月3日，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把在南昌的委员找来开会。会上，蒋介石说，广州会议“通过迁都决议时，奉系还没有盘踞北京，而现在张作霖已称自己是国家首领，并准备与北伐军打仗，湖北的军队靠不住，所以武汉处于危险之中，在已经得到巩固的南昌领导北伐是较好的。”

蒋介石的一番言辞虽然迷惑了一些人，但遭到邓演达、陈公博、宋子文等人的强烈反对。宋子文公开发表讲话，表示迁都是中央会议通过的，提议也是你蒋介石首先提出并赞成的，如果更改，必将失信于民，有碍政府的威信……

但蒋介石不顾一切，擅自向各省党部发出通电，经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现因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住南昌。”蒋还请在武汉办公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返回南昌办公，俨然凌驾于中央之上。

消息传来，在武汉的宋庆龄、宋子文等十分震惊，迅速商议对策。宋庆龄对蒋的做法洞若观火，明确指出蒋是在搞分裂活动，意图不轨，宋子文建议召开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形成决议，阻止分裂活动，说服蒋改正错误。会议最后形成决议，敦促蒋来武汉。

蒋迫于武汉方面的压力，不得不于1月12日由九江抵达武汉，并在公开场合赞扬汉口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是近代史

上最光荣的历史。在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之后，蒋仍旧坚持迁都南昌。

当晚，在宴会上，蒋介石刚刚讲完自己的想法，总顾问鲍罗廷便开口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 C. P.（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来打倒的。”蒋介石被鲍罗廷的一番话说得很尴尬，左右不是。便把目光投向了在座的宋子文等人，操着浓重的浙江口音说：“迁都南昌也是为了更好地推动革命嘛，两湖地区不稳定也是实情，等到东南安定后，再迁往南京，有何不可？”

“不可！”在座的宋子文首先反对，“南昌的中央政治会议是不足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的，本来这个政治会议就是非法的，所以这次决议不能否定广州中央会议的决定。迁都是蒋总司令提出的，已向国内外正式公布，无论从内政、外交、军事，人心等哪方面考虑都不能再改变，否则，后果在座的各位都很清楚意味着什么。”说到这里，宋子文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各委员，委员们都点头表示赞同。蒋介石在武汉中央联席会议委员中没有找到支持者。

1月17日，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上，蒋介石再次提议迁都南昌，同样又遭到反对。于是蒋不得不悻悻地回到了南昌。回南昌后，蒋并没有改弦易辙，而是继续想方设法对付武汉政府。他一方面征得谭延闿、戴季陶等人的同意，提出驱逐鲍罗廷的号召“我希望党和政府一致使鲍罗廷离开，像鲍罗廷那样跋扈的人，如果不能很快地叫他走，怎么还能完成革命任务？”另一方面，他串通代主席张静江致电武汉，要求取消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并要求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到南昌商议迁都问题。他还声明，中央已在南昌办公，企图造成既

成事实，为达到此目的，在江西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被蒋继续扣留。最后，蒋采用釜底抽薪之计，派他的得力干将戴季陶到武汉游说，力图分化委员们，拉拢他们到南昌办公。

由于武汉方面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并且不断制造舆论、施加压力，这时在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有的已不顾蒋介石的阻挠，先后设法离开南昌到达武汉。到2月中旬，大部分委员相继到达武汉。武汉方面考虑到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已汇齐，决定召开扩大联席会议，宣布联席会议结束，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在武汉开始办公。此时，蒋介石羽翼未丰，见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无奈，只得表示拥护，欢迎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都，并假惺惺发表讲话说：“武汉是全国的中心，亦是政治变迁之策源地，党部和政府到了武汉，一定比在南昌发展更快。

至此，蒋的迁都之争告一段落。

二、随着个人势力的膨胀，蒋介石撕下面纱，开始公开背叛革命；宋子文对美国记者希恩说：“你看，事实是，我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

蒋介石迁都南昌计划告败后，便开始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词句掩盖其真实意图。暗中却不断扩充军事实力，决定经营东南，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面对两湖地区高涨的革命形势，蒋把其嫡系部队和收编的依附部队放在江浙一带，蒋用军、师长的头衔收买旧军阀，牢牢地控制着各部队，一切调动须经他同

意方可。另一方面，蒋介石此时已迫不急待地开始着手反共反苏。1927年2月，他在南昌总部孙中山纪念周上发表演说：“现在共产党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国民党党员加以压迫，并有排挤国民党党员的趋向，使国民党党员难堪，做为国民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领袖，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制裁的权力……”

其后在3月7日，蒋介石攻击武汉政府，并将苏联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等同，胡说什么“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别个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反对他们……”

这两次演说是其背叛革命的前奏。恰在此时，江浙一带的资产阶级派出了他们的代表虞洽卿来到南昌，与蒋密谈，答应蒋只要“反共”，到上海、南京后，赠以巨额款项，蒋正急迫需要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金钱上的援助，以对付武汉革命政府和应付巨大军费开支，目的相同，一拍即合。不久，蒋介石到上海会见上海商业联合会代表时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就在蒋介石极力筹划东南，准备背叛革命与武汉分庭抗礼时，宋子文也到了上海。

由于戴季陶的一系列活动，使武汉的一些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在同蒋的斗争中出现了严重的动摇性，这些人公开发表演谈话表示蒋是国民党的领袖，支持蒋的一系列背叛革命的行径，这使得武汉政府威信受到影响。另外，这些言论也使原来工商界中支持过武汉政府的一些人改变了态度，使武汉政府的财经状况受到严重影响。于是武汉便派宋子文来到上海，目的是一

方面劝蒋不要搞分裂活动；另一方面是控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财政金融，使武汉政府有可靠的经济来源。

宋子文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去拜会蒋介石，二人似乎谁也没有想起以前的不快，见面很亲热，寒暄之后，宋子文先阐明了来意：

“想必蒋先生也接到通令了，弟这次来上海主持江浙两省财政，望蒋先生支持；另外，武汉方面希望蒋先生能抽空去一次，对一些革命之具体问题相商。”

蒋介石对武汉政府的做法心知肚明，但他并未急于表态，而是很婉转地试探宋子文：

“子文兄此次来沪经政府委派，中正当然鼎力相助，江浙一带对子文兄是很相信和佩服的，想必你已胸有成竹了吧？”

“这一切还要仰仗蒋先生帮助才能实现。”宋子文见蒋脸色没有什么变化，便知他为何而愁，接着说：“至于北伐军的军费，那是应予优先考虑的。”

“我知道你是很有才干的，可惜——。”蒋说到这里便打住了，话锋一转，“我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名义颁布布告，支持你对江浙进行接收处理。”

此后，宋子文成立了三个顾问委员会，邀请上海金融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参加，希望恢复同这些人的联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由于宋子文的地位和影响，上海金融界与宋子文迅速建立了良好关系，宋宅经常是宾客盈门，来往者多是上海金融界名人。这一切自然离不开蒋的视线，蒋见宋并无真意支持自己，便多次登门“劝驾”，而且派他的心腹孔祥熙和宋蔼龄来给宋子文“洗脑子”。然而，宋子文只想蒋介石与武汉谈判，这使蒋意识到宋的行为可疑，认为他起着武汉代理人的作用。于是

在一次与孔祥熙的谈话中蒋有些忧心忡忡地对孔说：“庸之，子文的态度让人担忧，跟着武汉会有什么结果呢？他本来是很有作为的嘛，现在共产党和左派势力越来越大，如不想办法扼制，局势是不堪设想的，你应多劝劝他，认清形势，认清形势嘛！”孔祥熙当然是心领神会。于是，一次又一次的轮番“轰炸”使宋子文不得不避开宋蔼龄和孔祥熙，躲在莫里哀路宋庆龄空着的房子里，但他又很快发现青帮的恶棍正在密切监视着这栋房子，这使宋感到恐惧和不安。

蒋介石一面争取宋子文，一面暗中调集部队，召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在广州的黄绍竑、李济深迅速到上海共商反共策略。在桂系的支持下，蒋反共的胆子壮了起来，步子也加快了。

正当蒋介石在上海策划反共清党时，远在法国的汪精卫由巴黎秘密回到上海，准备到武汉复职。蒋闻讯后，当即与吴稚晖去拜访汪精卫，并于4月3日发表了“拥汪通电”表示愿统帅各军，一致服从“汪之”“指挥”。后来，蒋与吴约汪至总司令部会谈，要求汪“很坚决的马上做两件事：一是赶走鲍罗廷，二是立即分共”。汪精卫因过去曾与蒋在权力分配上矛盾重重，这次又是应武汉政府“反蒋”之邀回国复职，立足未稳，如答应蒋，势必被蒋控制，所以，汪表示自己“站在工农方面”，以图要挟蒋介石。同时，汪精卫与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进行了接触和谈判，并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称蒋介石“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希望两党不听信任何谣言，继续实行‘开诚合作’”。《宣言》发表时正值蒋汪会谈，虽然《宣言》帮蒋介石掩盖了反动阴谋，麻痹了革命群众，但蒋的追随者皆对汪精卫的行动不以为然。吴稚晖尤为气愤，当众讽刺挖苦汪精卫。蒋却当场制止了吴，说汪的行为是可以理解云

云。

当汪精卫秘密乘船离开上海后，蒋介石对吴稚晖等人说：“我早料到留他不住的，不过，《宣言》可以帮我们的忙……”

随后，蒋介石开始公开撕下面纱，发动了南京四一〇事件和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事变后，蒋介石发出“清党布告”和“清党通电”，命令各地、各军对共产党“严加侦察，”凡被“举发者”即“以非常紧急处置”，“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机关”实行“看管监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准备在南京另立中央的又一严重步骤，他的阴谋得逞了，他控制了以沪、宁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完成了在南京建立政权的准备工作。

就在蒋介石背叛革命时，上海的金融界找上门来。原来蒋为维持其庞大的军费开支，向上海的金融界和企业家“贷款”。但这些银行家和企业家们似乎对蒋介石同武汉政府的关系没有完全明了，他们不甘心将钱“白白给”蒋介石，而自己却得不到靠山。于是这些人便将目光集中到了武汉的财政部长宋子文身上，纷纷登门上访，要求宋子文以财政部长的名义签字，讨一张偿还“贷款”的书面担保。他们这样做一来是宋系武汉政府财政部长，二来宋家是名门，宋子文享有声望。但这些人却在宋子文面前碰了钉子，宋以“政府未曾有此动意，弟不敢冒然决定”为托辞，当然是拒绝签字。

蒋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恼怒，除了背后免不了骂几句“娘西匹”之外，蒋置宋的权力于不顾，未征得宋子文同意便私自派出财政官员与上海金融界交涉。

蒋介石凭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军事实力，控制了东南，为其另立国民政府铺平了道路。

4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接受胡汉民的提议，称南京方面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胡汉民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决定南京国民政府之印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并宣布“即日办公”。

4月18日上午，南京国民政府于丁家桥旧江苏省议会举行成立庆典，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古应芬等被选为委员；胡汉民为政府主席；伍朝枢任外交部长；古应芬为财政部长，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会后，南京政府宣称已将武汉政府的司法部长徐谦、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一律免职，并令其他部长表明态度，未表明态度前，南京暂不任部长。

4月20日，蒋介石派人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

蒋介石的做法使宋子文反感，在很多蒋氏幕僚登门劝其脱离武汉，断绝来往，就任南京财政部长时，宋子文都是无动于衷，迟迟不肯低头。但精明的蒋介石岂能看不出其中奥妙，宋并没有在公开场合揭露蒋的行为，而且最重要的是武汉方面不断派人来到上海，劝宋离沪赴汉，宋始终没有表示回汉，这说明宋开始动摇了。于是，蒋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封闭了宋子文在广州苦心经营的银行，使宋子文感到绝望了，他开始恢心，无事可做，整天呆在宋庆龄空着的房子里。

6月，宋子文迎来了他在美国的朋友——记者希恩。当希恩了解到宋子文的处境后，对宋说：“T.V（宋英文名），同我一起离开这里吧，我们乘英轮离开上海，我保证你的绝对安全。”

宋子文想了想，“好吧，那就请你以广州王先生的名义给我买张船票，最好与你同舱。”

“那是当然的！”希恩说。

“你到过武汉，那边情形怎么样？”宋很关心武汉的事态发展。

当希恩将所了解的情况告诉宋子文后，宋开始沉默了，好长时间才对希恩说：“离开上海的事还没有征得家里人同意，等我回去与他们商量一下再做决定。”

当晚，宋子文回到家中，把要与希恩离沪赴汉的想法告诉了宋老夫人及孔氏夫妇，立刻遭到这些人的强烈反对。

“T.V，武汉现在到处是赤色分子，罢工、游行、集会到处都是，你去能干什么呢？你在那里又能有什么作为呢，不会有支持你的做法的，你的特长在那里不会得到实现的……”大姐宋蔼龄首先站出来劝阻。

“蔼龄说得对，蒋先生一向很看重你，他的前途是无量的，只有他才是中国的希望，现在的形势是许多元老们都在向他靠拢，他掌握着中国现在近半数的军队。而武汉就快要变成赤色的天下了，你的根基在这里，没有蒋你很可能一事无成……”孔祥熙自然不会错过奉劝之机。

宋老夫人也在孔氏夫妇的影响下向宋子文施加压力，要宋不要离开上海，至于为谁效力，那自然不是她所关心的。

这样，宋子文终于改变了回武汉的想法，第二天，他心事重重地对希恩说：

“我没有理由去（武汉），你看，事实是，我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我不喜欢革命，不相信革命。如果劳工政策使所有的商人和工厂老板吓得不敢开业，我怎么能平衡预算或使货币流通呢？我无法使中央执委会理解……看看他们把我的钞票弄成什么样子了，我的多好看的钞票啊！它们膨胀得一文不值了……”

“唉，我姐姐……我姐姐不理解。谁也不理解有多么困难。